

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述论

杨雨蕾

一、汉译西学书

自 16 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以后,一般将有关西方宗教文化的图书称为“西书”。“西书”入中国的一大高潮在耶稣会士入华期间。1540 年创办的耶稣会为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 16 世纪末叶选派了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r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Franciscus Passio)、利玛窦(Matteus Ricci)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罗明坚终于在 1582 年得到广东制台陈文峰的允准,入住肇庆并正式传教。罗明坚在明末首先进入中国内地,并最早在 1584 年刊布了他用汉文写作的《天主圣教实录》。之后,利玛窦、艾儒略(Julius Alen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人为了广播福音,继续用汉文翻译、编写了大量天主教及西方科学书籍。在这些西书中,或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编写的,或经他们口传后由中国协助者编写的,还有他们写稿后借助中国人加以润色的。如《天主实义》和《西学凡》分别由利玛窦和艾儒略编撰;《几何原本》先由利玛窦讲述,后由明末硕学名臣徐光启记述;《灵言蠡勺》由毕方济(Sambiasi)口传,徐光启笔录。^①

在中国刊刻的这些西书自 17 世纪起陆续传入朝鲜,其数量相当可观。韩国李万珪曾将天主教入朝鲜分为三个阶段^②,其中第一阶段即从宣祖 33 年(1600)到宪宗 1 年(1835)为书籍输入时期。事

实上,正祖9年(1785)天主教作为邪教被禁,在中国的西书被禁止输入,而此时中国也发生了乾隆朝大教案,因此大量西书传入朝鲜在正祖9年禁教以前。这段史事,韩国学术界已有较深的研究,但是在中国还所知甚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在这方面研究卓著的学者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用汉字著述或编译的有关西方文明的书籍称为“汉译西学书”或“汉文西学书”^③。本文采用较为流行的汉译西学书的说法,就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的情况作一考察,时间限于1603年史料记载西书首次入朝鲜^④至1785年正祖下令禁止从中国输入西学书籍。

二、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的历史背景

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立,经过一个世纪以后,到16世纪已呈现衰落之势。政治上,土地的大量兼并使统治阶级与农民间的矛盾加深,与此同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也使两班官僚社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十分激烈;思想上,传统的儒学思想与政治现实的距离相当大,且面对当时各种学派的批评,自身的矛盾亦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1592年开始发生了历时七年的“壬辰倭乱”^⑤,之后的1627年和1636年发生了“丁卯胡乱”^⑥与“丙子胡乱”^⑦。这些事件又使朝鲜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更趋尖锐。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批判社会现实、主张改革的实学者们在朝鲜应运而生。这些实学者十分关注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虽然理解各自不同,但是都十分关注汉译西学书,希望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以强化自己的观念和主张,改变当时朝鲜社会的现状。朝鲜西学便由此而生,成为之后朝鲜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西学”指在朝鲜王朝后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汉译西学书和西洋文物而进行的一种学问活动^⑧。从广义上说,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天主教思想,另一方面是传教士传来的西洋科学技术,它们均通过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社会,在知识界引起极大

的震动。当时，“名官儒生无所不闻，常时备置于书斋，视如诸子百家著作或道佛之书。”^⑨李瀛（号星湖，1681—1763）在收集并阅读了大量汉译西学书后^⑩，成为朝鲜探求西学的先驱。之后他的弟子在朝鲜掀起了研究西学的高潮。他们阅读汉译西学书，深入加以理解，对西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天主教理解为西学的主要内容，并去实现这种宗教生活，如洪儒汉、李蘖、李承薰、权日身、丁若钟等，他们传播、用韩文翻译、并在朝鲜刊行天主教教理方面的西书，积极推行天主教；另一种反对天主教，却关心西洋科学技术，积极引进它们并将之运用于现实生活，同时加以发展，如洪大容、丁若镛、崔汉绮等，尤其是洪大容，在西学影响下最后竟成为朝鲜北学的集大成者。

而从更大的视角看，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延伸。韩国学者李元淳将明清间移植于北京一角并已汉化的欧洲文化称为“清欧文明”^⑪，这一概念实在是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结果极好的概括。事实上燕行使臣在中国接触西洋文化，与传教士直接交往，之后作为“文化导管”传入包括汉译西学书在内的“清欧文明”正是朝鲜西学的直接来源，同时也影响到后来朝鲜北学的产生。

三、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过程概述

朝鲜实学派先驱李睟光（号芝峰，1563—1628）在光海君 6 年（1614）刊行的《芝峰类说》中写到：“欧罗巴国，亦名大西国。有利玛窦者，泛海八年，越八万里风涛，居东粤十余年。所著《天主实义》二卷，首论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养之道；次论人魄不灭，大异禽兽；次辩论六道之谬，天堂地狱善恶之报；末论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义。其俗谓君教化皇不婚娶，故无袭嗣，择贤而立之。又其俗重友谊，不为私蓄，著《重友论》。焦竑曰：‘西域利君以为友者第二我。’此言奇甚云，事详见《续耳谭》。”^⑫这是在朝鲜首次介绍西方

及有关汉译西学书。此外,书中所记1603年李光庭、权愔传入“欧罗巴国輿地图一件六幅”^⑬,是汉译西学书入朝的最早记录^⑭。

一般认为1603年由李光庭、权愔所传入的地图是为欧洲文化传入朝鲜之嚆矢^⑮。另外,李晬光在书中说《续耳谭》有《天主实义》的内容,但他对《天主实义》内容的介绍与三口正之引用《续耳谭》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两者相比,前者的内容更为详细。再说芝峰在壬辰倭乱前后作为使臣数次往来于中朝间,可能直接阅读到《天主实义》,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本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教理书在此前后当已传入^⑯。

光海君2年(1610),陈奏副使^⑰许筠使明归来,对此,柳梦寅《於于野谭》记载:“其教(天主教)已行,东南海诸夷,颇有尊信者,独我国未及知。许筠到中国,得其地图及《偈十二章》而来。”^⑱朴趾源在《燕岩集》中也写到:“《野乘》仇罗婆之国有道曰伎利但者,方言事天也,有《偈十二章》。许筠之使中国,得其偈而来。然则邪学之东,盖自筠而倡始矣。顾今邪说之辈,自是筠之余党也。其言论习尚,一串贯来,宜乎其邪说之酷好而偏惑也。”^⑲

可见许筠此次出使带回地图与《偈十二章》,并可能最早将天主学传入朝鲜^⑳。其所带入地图的详情今已无从得知。此外,《偈十二章》从不见于有关中国西书的著录,似在中国早已佚失。

光海君6年(1614),许筠作为千秋使^㉑再次使明回国,带入所购书四件,^㉒书名不详,但他作为倡导天主学者,可能买来的仍是西学书。

之后,仁祖九年(1631),“郑斗源回自京师,献西洋人陆若汉(Jeronimo Rodriquez)所赠《治历缘起》一册、《天主略》一册、《利玛窦天文书》一册、《千里镜说》一册、《职方外纪》一册、《西洋国风俗记》一册、《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镜疏》一册、《天文图南北极》两幅、《天文广教》两幅、《万里全图》五幅、《红夷炮题本》一”^㉓和“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焰硝花、紫木花等物”。^㉔当时关外的辽东地区已为清军所占领,郑

斗源过黄海经山东到北京,往返时均在山东登莱短暂停留,其间与陆若汉有交往,并得到他赠予的汉译西学书^②。关于书的具体内容见姜在彦在其《朝鲜的西学史》中的详细说明^③。

1644年3月,清军攻入北京城;同年9月,作为质子的朝鲜昭显世子随顺治帝到北京,11月回国。在北京期间他滞留在紫禁城的文渊阁,与钦天监正汤若望结成深交,了解到天主教与西洋的科学技术,十分高兴。他在给汤若望的信中谈及天球仪和天文书时曾写道:“我国不是没有类似的东西(指天球仪与天文书),但数百年来推算天行常有误。现在得到这些珍品怎能不高兴。我想如果回国,不仅要在宫廷中使用,而且要出版,将它们普及到知识层。”^④

汤若望在昭显世子回国时赠送了各种西洋书籍、地球仪与天主像等。黄伯禄《正教奉褒》记载:“顺治元年(1644),朝鲜国王李倭之世子,质于京,闻汤若望名,时来天主堂,考问天文等学。若望亦屡诣世子馆舍谈叙。久之,深相契合。若望频讲天主教正道,世子颇喜闻详询。及世子回国,若望赠以所译天文、算学、圣教正道书籍多种,并舆地球一架,天主像一幅。世子敬领,手书致谢。”^⑤可知昭显世子传入的是汤若望翻译的天文、算学、圣教正道方面的书籍,^⑥但无从得知具体书名。

以上“朝鲜人对西欧学之接纳多属智识上之好奇”,“均系偶然接触”^⑦。顺治2年(1645)后,朝鲜政府因修历之需要,又通过燕行使臣主动输入大量汉译西学天文、历算书。

1645年3月,和昭显世子同为质子的凤林大君^⑧回国,护行宰臣韩兴一得到汤若望寄赠的《改界图》和《七政历比例》。同年6月,“韩兴一上答曰:‘历象、授时,帝王之先务。元朝郭守敬修改历书,几四百余年,今当厘正。而且见汤若望所造历书,则尤宜修改。敢以《改界图》及《七政历比例》各一卷投进,请令该掌使之审查裁定,以明历法。’”^⑨12月,观象提调金堉等人极力主张像清朝一样引进西洋历法,进行改历^⑩。同日,奏请使金自点自北京带回汤若望所造新历^⑪。

顺治3年2月,谢恩兼陈奏副使金堉携两名日官^③到北京,因门禁未能见到汤若望,然买得部分有关书籍^④。6月,谢恩使李景奭出使,“以《时宪历》密贸之事广求于人,而得之甚难。……适逢本国日官李应林之子奇英被掳在彼,其人颇通算数,且惯华语。(臣)使之学习历法于汤若望,约以他日,当遣其父,传学以来。且给白金数十两,使买历法之书于汤若望,以为他日取来之计……”^⑤。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上清朝礼部咨文,请颁历书。清政府于顺治五年(1648)始“给与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⑥,此王历当即汤若望主持新修的《时宪历》^⑦,之后清朝每年将新历颁与^⑧。

仁祖26年(1648)9月,日官宋仁龙被遣学《时宪历》算法于清廷^⑨,第二年(1649)2月归国,带回汤若望所赠的《缕子草》15卷和《星图》10丈^⑩。孝宗即位后(1650),为解新历,于第二年冬遣金尚范随使至京,“持重赂学于钦天监”^⑪,然所学并不完全。孝宗4年(1653)正月,新历依新法推算印行^⑫。次年正月,观象监请再遣精于历法者随陈奏使往学^⑬,购得《日躔表》、《月离表》^⑭。

肃宗31年(1705),观象监发现所造翌年历书与清朝所颁相左,随后发现孝宗5年(1654)所购《日躔表》和《月离表》为抄本^⑮,于是日官许远入燕买得方书归^⑯。然据此推算仍有多处不合,1713年和1715年许远又两次随使入燕,学习并购得《时宪历七政表》、《仪象志》、《日蚀补遗》等书^⑰。

之后由于经推算所造历书常与清朝所颁有不合之处,朝鲜政府又多次遣日官随燕行使入燕求教于钦天监,学习西历历算,求购所缺天算资料。英祖26年(1750),译官卞泰禧、徐庆运于北京东西天主堂与钦天监购得《新法日月蚀算表》、《日月五星七曜表》等^⑱。以后,因为中国禁教趋严,西人不再向中国介绍天文、历算,于是朝鲜方面不能再从北京获得新的汉译天文、历算书籍。

朝鲜政府通过燕行使臣主动求得汉译西学天文、历算书记述如上。除此之外,这期间燕行使臣还传入包括天主教教理书在内的

其他汉译西学书。裴贤淑曾撰文考察传入朝鲜的天主教教理书,举述 64 种,虽发现传入者大多不详,但认为这些书籍均系通过燕行使臣传入,并指出燕行使臣获取这些书的途径有三:一是他们在与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传教士的寄赠;二是他们从北京外城慈仁寺外的琉璃厂书肆购入;三是在栅门等处进行秘密贸易获取。^⑤

我们知道,在当时封闭的朝鲜社会,燕行使臣是它与国外接触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从 1645 年(顺治二年,仁祖 23 年)到 1785 年(乾隆五十年,正祖九年)的 141 年间燕行使行共 292 次,年平均 2.07 次^⑥。这些频繁往来的燕行使臣在清朝文化中心燕京逗留期间,除例行公事进行朝贡礼节,参加各种仪式和宴请,还利用公事之余暇参观名胜、古迹、寺刹、宫阙等,与文人、学者交流学问、思想。有关的活动和见闻载录在一些使臣所著的燕行录中。据这些燕行录所记,不难看出燕行使臣接触西学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访问天主堂和钦天监,通过笔谈与传教士进行交流,购买或得到寄赠的书籍和西洋科学用具^⑦;二是在北京琉璃厂书肆搜书、购书活动过程中与清朝文人进行交流,并购买有关书籍^⑧。由此可知燕行使臣主要是在与传教士的交往过程中或在琉璃书肆搜书、购书过程中获取汉译西学书的。然而由于中国乾隆时期禁教趋严,加之朝鲜正祖 9 年天主教作为邪教被禁,存有的相关史料并不多见。现尚传世的有关燕行录中可见一些,如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志》记载了他在英祖 8 年两次作为使臣燕行期间,走访天主堂并得到费姓西洋人寄赠的《三山论学记》、《主制群征》各一册和医药品^⑨。另外传教士文献中也有若干线索,如倪天爵神父,“1720 年,他向到达北京的朝鲜官员们赠送了一些基督教经典。”^⑩再有的是一些零星史料,如在郑灿钦墓志铭中说到“从燕肆带来西洋书”^⑪。显然有关史料尚待深入探查。

比较西书入华的过程,西书传入朝鲜与之有所不同。在中国,西书的始传完全是当时耶稣会士为广播福音所致;而在朝鲜,西书

的传入则是朝鲜政府及燕行使者主动所为。即使是当时天主教传入朝鲜,一些燕行使臣也有积极主动的意识和活动。法国人德古勃朗(Mgr. de Guebrant)1925年5月9日曾上谕教皇说:朝鲜天主教的形成是世界教会史上惟一的特例,学者们在寻求宇宙解释的自发研究中发现天主教理书闪烁着神秘的光明,这些书通过使臣传入朝鲜^⑤。而在事实上,前述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的过程表明,通过燕行使臣传入的不仅仅是汉译天主教理书,还包括西洋科学技术书籍。

四、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的内容

关于汉译西学书的内容,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序言中写到“西士遗留与吾人之书籍,大纲可分为宗教及科学两类,其细目亦可分析言之:宗教书中有论道理及讲修成之书,有辩护、辟迷、释难、解惑之书,有圣人行实及圣教经文等书。科学书中有天算、地舆、水学、哲理、小学、形下学等等。”^⑥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无外乎也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关于天主教教理、哲学、伦理、修德、典礼及与儒、佛、道教比较的书籍^⑦,包括有名的《西学凡》、《七克》、《辨学遗牍》、《二十五言》等。二为西洋科学技术方面的图书,包括历法、天文、地理、算数、医药等方面的图书,如《天文略》、《几何原本》、《数理精蕴》、《泰西水法》等。有关天主教书籍,裴贤淑在《17、18世纪传来的天主教书籍》一文中有详细的目录及说明,她考证了传入朝鲜每种书的种类、传入者、传入时期、传入路径等^⑧。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所考证的64种书中有5种是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和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中国史学丛书,24,全1册)、《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中国史学丛书,40,全3册)、《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中国史学丛书续编,21,全6册)所没有收录的,它们是:《偈十二章》、《默珠神功》、《三

本答问》,《西洋风俗记》,《圣教切要》^⑧。这有助于补充入中国的西书书目。

至于科学技术书籍,尚无专门的研究文章,今梳爬有关资料,初步列表如下^⑨:

朝鲜传入汉译西学书(科学技术)一览表(初稿)

类别	著者	传入书名	传入者	传入时间
地 图 地 理	利玛窦	坤輿万国全图	李光庭,权愔	1603 年
	李应试、 冯应京刊刻	两仪玄览图 6 幅	黄东溟	1604 年
		天文广教 2 幅	郑斗源	1630 年
	汤若望	天文图南北极 2 幅 ^⑩	郑斗源	1630 年
	艾儒略	万国全图 5 幅	郑斗源	1630 年
	汤若望	西洋乾象坤輿图 8 帖	昭显世子	1644 年
天 文 历 算	徐光启、 龙华民等	治历缘起 1 册 ^⑪	郑斗源	1630 年
	阳玛诺	天文略 1 册	郑斗源	1630 年
		利玛窦天文书 1 册	郑斗源	1630 年
	汤若望主持	西洋新法历法	金自点	1645 年
		日月五星历指 ^⑫	金堉	1646 年
		浑天仪说 ^⑬	金堉	1646 年
		缕子草 15 卷	宋仁龙	1648 年
		星图 10 丈	宋仁龙	1648 年
	汤若望主持	时宪历	洪桂元	1648 年
	汤若望译撰	日躔表	日官(姓名不详)	1651 年
	罗雅谷译撰	月离表	日官(姓名不详)	1651 年
		时宪法七证表	许远	1705 年
	南怀仁	仪象志	许远	1713 年
		交食证补	许远	1715 年
		日蚀补遗	许远	1715 年
		历草骈枝	许远	1715 年
	利玛窦	乾坤体义 2 卷	?	?

类别	著者	传入书名	传入者	传入时间
天文 历算		七曜算本	?	1725 年
	徐懋德	历象考成	?	1726 年
	徐懋德	历象考成后编	李世澄	1729 年
		日月蚀稿	李世澄	1729 年
		火星纬度	李世澄	1729 年
		七政四余万年历 3 册	安重泰	1733 年
		五更中星纪 1 册	安重泰	1733 年
		中星纪 1 册	安重泰	1733 年
		日月交食稿本 各 1 册	安重泰	1733 年
		日月五星表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日月交食表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历象考成后编 10 卷	金兑瑞、安命说	1743 年
		新法日月蚀算表	卞泰禧、徐庆运	1750 年
		凌范表	卞泰禧、徐庆运	1750 年
		日月五星七曜表	卞泰禧、徐庆运	1750 年
		仪象图 ^⑤	卞泰禧、徐庆运	1750 年
数理	利玛窦、 李之藻	同文算指	李颐命	1720 年
		数理精蕴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八线表 ^⑥	李世澄	1729 年
		对数八线表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对数阐微表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利玛窦、 徐光启	几何原本	李承薰	1783 年
器具	汤若望	远镜锐	郑斗源	1630 年
		千里镜说	郑斗源	1630 年
		红夷炮题本	郑斗源	1630 年
水利	能三拔	泰西水法	郑斗源	1630 年
音乐	徐日升, 德理格编	律吕正义	安国麟、卞重和	1741 年

类别	著者	传入书名	传入者	传入时间
医学		洋牧露方	?	?
		全体新论	?	?
		西医略论	?	?
		内科新论	?	?
		妇婴新说	?	?
		博物新编	?	?

本表资料来源:《朝鲜王朝实录》,影印缩刷版,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朝)洪凤汉等编著:《增补文献备考》,全3册,3版,明文堂,1985.3;(韩)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一志社,1986.12;(韩)金玉姬:《韩国西学思想史研究》,韩国国学资料院,1998.1;(韩)李元淳:《韩国天主教会史研究》,韩国教会史研究所,1986.9;(韩)姜在彦:《朝鲜的西学史》,民音社,1990.9;(韩)全相运:《韩国科学技术史》,正音社,1976.2;(韩)李龙范:《韩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东国大学校出版社,1993.3。

上表中所列仅是今可见于史料记载的传入朝鲜的西方科学书籍,实际上当远不止这些。例如昭显世子归国时带入天文历算之书,史料中已佚失具体书名。但从所见资料可知,传入朝鲜的西方科学技术书主要包括天文、历算、数理、器具、水利、地理、地图等,其中天文历算方面的书最多,这是因为朝鲜与中国一样,天文历算被认为是帝王之学,历象的测算是否准确至关重要。

此外,《黄嗣永帛书》记有“李蘖据理答之,家焕辞屈,遂求书细览,李蘖与初函书数种,时有《圣年广益》一部。”^⑩看来李家焕从李蘖处得见《天学初函》,由此可知最具影响力的《天学初函》确实传入朝鲜。《天学初函》为明崇祯元年(1628)李之藻、徐光启等人所编,分“理篇”,“器篇”两部分,共收书19种,52卷,其中理篇9种,器篇11种。《天学初函》所收入的书许多在此丛书刊行前已传入。

五、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的影响

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对朝鲜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朝鲜社

会长期处于极为封闭的状态,部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效仿中国,奉行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对外关系上,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与国外的关系仅限于派遣固定的朝贡使团到中国和使团到日本。壬辰倭乱后,对外关系更是仅限于中国。燕行使臣这时主动传入汉译西学书,带入欧洲的思想和文化,活跃了当时的思想界,促进了朝鲜文化的发展。世界地图和西方地理书籍的传入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克服了自身认识的局限,意识到世界之大,中国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开始挑战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意识;天文、历算书籍的引入则是儒教传统社会朝鲜王国要利用西欧科学技术文明的开端,《时宪历》的采用及其他西洋科学技术的运用反映了趋向实利的近代思想萌芽及合理实用的开放态度在朝鲜的出现;此外,天主教教理书的传入更是直接导致了朝鲜天主教教会的形成。朝鲜的天主教教会虽历经迫害,但最后发展出将近一万人的教徒,这在长期奉行儒家传统的封闭的朝鲜社会“不仅意味着新的信仰实践,而且还意味着新的伦理性价值体系的接受。”^①

尽管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在当时并未成为改变朝鲜社会的契机,但它们影响了当时一批以李瀾为代表的西学者和以洪大容为代表的北学者,而“为西学者或北学者所觉醒起来的对外开放态度和引进先进技术文明的态度却反映了(朝鲜)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向”,“这种近代化萌芽不顾强行镇压和暗中压迫依然在李圭景‘名物度数之学’或崔汉绮‘运化气之经验哲学’中露出微光而且通过他们的学问而得到持续发展,最终成为(朝鲜)开化思想的基础。”^②

包括汉译西学书在内的西学传入朝鲜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延伸。正如黄时鉴所说,“从中西关系史的视角来考察中韩关系史,就很容易感知,中西关系史常常延伸到韩国(还延伸到日本),而韩国(还有日本)历史上与西方的交往则又往往

是以中国为中介的。在古代,佛教从印度和西域传到中国,而后再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中韩、中日的佛教交流史乃是佛教入华史进一步向东的延伸。大航海以来,西学东渐,先到中国和日本,而朝鲜王朝时代的西学则首先是经由中国传过去的。韩国的西学初传史也是西学入华史进一步向东的延伸。”^⑧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总是更多地视角局限在中国。现在我们将这段历史放在东亚或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当我们的学术视野从“中西”扩展到“东西”时,我们既会对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课题做得更深,也会对中韩(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些研究课题做得更好。本文在考察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的过程中发现朝鲜史料中有在中国不曾见的汉译西学书,它弥补了有关的中国文献的缺失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西书传入中国的知识。由此可见,对西学在朝鲜的研究无疑又会加深西学东渐这段历史及其意义的了解。

再看作为“清欧文明”的汉译西学书入朝鲜后最终导致的结果,它实在发人深思。和中国一样,执政者并未以此为契机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是支持了当时在朝鲜猛烈抨击西学的辟卫论者的观点,在强调正学(性理学)振兴的同时,将西学作为邪学全面封禁。大量汉译西学书被烧,政府更加顽固地坚持传统的文化意识,并强硬地维持一种隔离的政策,以至于到19世纪末,面对日本的威胁表现出无法驾驭的混乱,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李元淳在论述朝鲜西学时曾说:“无论任何时代,都必须积极接触异质文化体系,而对此主动的加以研究和有选择的加以接受的‘接变’的历史性活动则是需要发展的。应该明白,与世隔绝的民族主义封锁态度是回避历史发展的。只能导致停止与挫折。在奔向地球社会的21世纪行将到来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体会为了民族历史发展的本民族自生的契机。”^⑨我想这的确应成为任何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事实上,任何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

依靠其本身内在的动力，而且还依靠其不断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人们应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这样才能使本民族文化立于不败之林；同时，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样才能丰富并进一步推动发展整个世界文化。

注：

①（韩）李元淳：《朝鲜西学的历史意义》，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340。

②即从宣祖33年（1600）到宪宗1年（1835）为西书和西洋文化流入期，从宪宗2年（1836）到高宗20年（1883）为天主教传教士到来期（1836年西洋神父罗伯多禄——Dierre-Philibert Maubant入朝鲜），从高宗21年（1884）到隆熙4年（1910）为新教传教士到来期。见《朝鲜教育史》，乙酉文化社，汉城，1949，下册，页13—14。

③（韩）李元淳称之为“汉译西学书”，见其《朝鲜后期实学者的西学意识》，载《历史教育》，卷17，1975年，页135，140。（韩）金玉姬称之为“汉文西学书”、“东传汉文西学书”，见其《西学的接纳和意识构造》，载《韩国史论》，第一辑，1975年，页192。

④⑭⑥⑩朝鲜时代李睟光在《芝峰类说》首次记载了世界地图入朝鲜的情况：“万历癸卯，余忝副提学时，赴京回还使臣李光庭、权愔以欧罗巴国舆地图一件六幅送于本馆，盖得与京师也。”（朝）李睟光著，（韩）南晓星译：《（国译）芝峰类说》，韩国乙酉文化社，1994年，上册，页515。

⑤又称壬辰卫国战争。1592年4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历时七年，最后在明朝的帮助下取得最后胜利。

⑥1627年1月后金为人主中原而发动的对朝鲜的侵略行动，历时7个月，最后在朝鲜义兵的英勇抵抗下，被迫撤离。

⑦1636年12月后金改国号为清，为人主中原对朝鲜再次武装入侵，仅2个月，朝鲜投降，之后朝鲜两王子（昭显世子和风林大君）作为质子入沈阳，从此朝鲜对清事人臣之礼，而两质子直到清入关后才得以永归。

⑧⑩⑪（韩）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汉城，一志社，1986年，页13—14；页116；页59。

⑨（朝）李熙弼著（本文“朝”指朝鲜时代，下同）、（韩）金时俊译：《辟卫篇》，明文堂，1987年，页485。

⑩前揭（朝）李晬光：《（国译）芝峰类说》卷2，地理门，外国3，页515。

⑪韩国李元淳认为此《欧罗巴舆地图》6幅是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版（见《朝鲜西学史研究》，页39），然笔者以为无从判断其为李之藻刊刻本还是刻工刊刻本，参见金良善：《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制作的世界地图》，载《梅山国学散稿》，页163—193。

⑫（韩）裴贤淑：《17、18世纪传来的天主教书籍》，载韩国教会史研究所编：《教会史研究》，第3辑，1981年，页8。

⑬参见上揭书。

⑭朝鲜对中国责问与误会的辩解以及报告有关朝鲜重大政治事件的使行。

⑮（朝）柳梦寅：《於于野谭》，卷2，页22。

⑯（朝）朴趾源：《燕岩集》，庆熙出版社，1966年，页47。引文中的“仇罗婆”与“伎利但”两词当为西文欧洲、基督教之音译。

⑰朝鲜时代李圭景、安鼎福对此亦有记载。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记：“此教（天主教）入我东，则按李泽堂《泽堂集》自许筠始，‘许筠始得天主教之书，学习曰，男女情欲，天也；伦纪之分，则圣人也，天且高圣人一等，我从天不敢从圣人云。其渐已著。’”，见《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邪教辨证条，页705。安鼎福在《天学问答》说：“或曰古今言天学者，不无其人。古有邹衍，于我朝有许筠愿得其实……筠则聪明……倡言曰：‘男女情欲，天也；分别伦纪，圣人之交也，天尊于圣人，宁违圣人而不敢违天禀之本性。’”，此外，他还说“（许筠）倡为天学之说其实与西士之学不同”，见《天学问答》，载前揭《辟卫篇》，页484。

⑱当是祝贺皇太子生日的使行。据《明实录》记载，万历42年（1614）8月辛卯，皇太子千秋。《朝鲜王朝实录》记有许筠同年10月回自明朝。

⑲“（七年乙卯二月）癸未，传曰许筠贡来册四件，入之。”《光海君日记》，影印本，卷87，7年2月癸未，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2，页358。

⑳（朝）洪凤汉等编著：《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页19（下册，3版，明文堂，1985年，页846）；参见（韩）姜在彦：《朝鲜西学史》，

汉城,民音社,1990年,页50。

②④《仁祖实录》,卷25,九年辛未七月,甲申,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437。

②⑤②⑥参见(韩)姜在彦:《朝鲜西学史》,页49—57。

②⑦(日)山口正之:《朝鲜西教史》,日本,雄山阁,1967年,页64。参见姜在彦:《朝鲜西学史》,页53—54。

②⑧黄伯禄:《正教奉褒》,上海慈母堂,1884年,页25。

②⑨根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页373—374)和(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页167—186),汤若望的译著如下:

天主教教理书:《进呈书像》一卷,《主教缘起》四卷,《主制群征》二卷,《真福训诂》一卷。

天文、历学书:《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新历晓惑》一卷,《远镜说》一卷,《恒星出没》二卷,《交食表》,《共译各图八线表》,《奏疏》四卷,《新法表异》二卷,《赤道南北两动星图》,《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徐光启、汤若望、罗雅谷等合撰)。

昭显世子可能传来其中的全部或部分。

③⑩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载《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30。

③⑪后为国王,即孝宗。

③⑫③⑬③⑭《仁祖实录》,卷46,23年6月甲寅,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226、254。

③⑮朝鲜观象监制算历法的官吏。

③⑯(朝)洪凤汉等编著:《增补文献备考》,卷1,象纬考,页5,6(上册,3版,明文堂,1985年,页19)。编者以为金堉所购书籍为《日月五星历指》及《浑天仪说》,它们是《时宪历》的一部分。

③⑰《仁祖实录》,卷47,24年6月戊寅,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278。

③⑧《同文汇考一》，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页803。

③⑨④⑩《仁祖实录》，卷49，26年2月壬辰，页803—814。

④①④②《仁祖实录》，卷49，26年9月辛巳，27年2月壬辰，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334；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343。

④③（朝）洪凤汉等编著：《增补文献备考》，卷1，象纬考，页6（上册，3版，明文堂，1985年，页19）。

④④《孝宗实录》，卷10，4年正月癸酉，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5，页605。

④⑤《孝宗实录》，卷14，6年正月庚子、辛丑，见《朝鲜王朝实录》，卷36，页1。

④⑥④⑦《肃宗实录》，卷42，31年6月庚子，见《朝鲜王朝实录》，卷40，页159—160。

④⑧④⑨参见《增补文献备考》，卷1，象纬考，页6，7；《肃宗实录》（补缺正误），卷55，页2，见《朝鲜王朝实录》，卷40，页547；《肃宗实录》，卷56，页3，见《朝鲜王朝实录》，卷40，页549。

⑤⑩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载《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36。

⑤①参见（韩）裴贤淑：《17、18世纪传来的天主教书籍》。栅门，朝鲜时代中朝陆上边境贸易之处，在中国界内。

⑤②参见（韩）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载《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93—197。

⑤③参见黄时鉴：《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载《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05—424。

⑤④参见（韩）李元淳：《燕京琉璃厂市与朝鲜学人》，载《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历史卷》，打印稿，1997年，页112—124。

⑤⑤（朝）李宜显：《陶谷集》，卷30，《庚子燕行杂识·下》，载《燕行录选集》，下卷，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年，页517。

⑤⑥（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页267。

⑤⑦（朝）黄得吉：《嘉善大夫同知中枢事郑公灿钦墓志铭》，在《下庐先生文集》，木板本，1827年，卷14，张25a。转引自前揭《17、18世纪传来

的天主教书籍》。

⑤⑧见（韩）金玉姬：《韩国西学思想史研究》，页43，44，注10。

⑤⑨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页1—2。

⑥①裴贤淑《17、18世纪传来的天主教书籍》一文，拙译为汉文，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付印中）。

⑥②李元淳说《畏天爱人极论》和《西洋统领公沙效忠记》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没有（见《韩国天主教会史研究》，韩国教会史研究所，1986，页19—20）。事实上此两书可见于《提要》，页74，页331。

⑥③本表所列为史料中出现的有具体书名的书籍，笔者仅在此罗列，未详加考证。

⑥④即《赤道南北总星图》。见姜在彦：《朝鲜西学史》，页53。

⑥⑤《崇祯历书》的一部分。见姜在彦：《朝鲜西学史》，页30。

⑥⑥⑥⑦《时宪历》的一部分。

⑥⑧乾隆十七年（1752）戴进贤所著《仪象考成》中一部分。

⑥⑨《数理精蕴》的一部分。

⑦⑩《黄嗣永帛书》，行46—49。转引自（韩）金玉姬：《西学的受容及其意识构造》，载前揭《韩国西学思想史研究》，页54。

⑦①⑦②⑦④前揭《朝鲜西学的历史意义》，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页357、364、365。

⑦③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6。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